

岁月悠悠

铅笔刀

■张勤文

小时候的学习文具里,除了铅笔、橡皮、直尺、三角尺之外,铅笔刀也是重要成员之一。

那时的铅笔刀是用铁片制成的,造型简易,花一毛钱能在大队供销小店里买到一把,彼时的物价来讲,一毛钱也不算便宜了。新买的刀片锃亮锋利,上面还有一层润滑油。刀壳颜色红的,蓝的,绿的都有,折叠起来,小巧便携。

铅笔刀,顾名思义是用来削铅笔的。我们读小学时,活动铅笔还没面市,卷笔刀也很稀罕,铅笔主要是靠刀来削的。削铅笔也有技巧,力度轻重要掌握好。削木质外壳时力道要大一点,削去的长度要保持一致,削铅笔芯时用力要轻一些。最好将笔芯抵在桌角上,慢慢转动铅笔,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均匀削去,用力过度笔芯容易断掉。

我们小时候能省则省,懂得物尽其用,削下来的笔芯碎屑也不会浪费丢弃,收集起来也能派上用场。一是用来打磨自制的木头枪,涂在上面反复擦拭,直到乌黑发亮,这把木头枪也更显逼真,别在腰里别提有多神气了,自己仿佛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,全然不顾手上、腰间被笔芯屑染黑。二是对那些打开时不大利索的锁、门窗铰链等,可在锁孔、铰链中灌入一点笔芯屑,可使其润滑如初。

虽然名曰铅笔刀,其实并不单单用于削铅笔。在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手里,铅笔刀是多功能的。那时小学操场边有条浅浅的小河,课间下课,河边总是聚满了同学,跪在那里用铅笔刀挖白嫩嫩的茅根,可当解馋的小零食,嚼起来颇为脆甜爽口。生活中还会用铅笔刀削山芋、刨地梨、切甘蔗等等。那时的玩具也是自己动手制作的,用泥巴雕刻手枪、坦克、军舰,削竹子做笛子、弓箭、兵兵子等都离不开铅笔刀。

记忆深刻的是,三年级的一天,午后休息时段,我和同学阿田在教室里划了一个小圈圈,玩起了流行的丢铅笔刀论输赢游戏。通过剪刀石头布决定了顺序,我先把铅笔刀放在圈子中间,胖墩墩的阿田来到圈子边上,站得直直的,只见他将铅笔刀举至眼角,再三瞄准后往我的铅笔刀上丢落,结果虽然砸中了我放在圈中的铅笔刀,却没能碰撞出划好的界线。

轮到我时,我没有贸然出击,而是先观察了一番,发现阿田那把铅笔刀头上离地面有一点间隙,就决定从那里寻求突破口。我也站直身体,把铅笔刀摆到眼角,尽量平心静气,瞅准角度,一鼓作气把铅笔刀丢落下去,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刀头部位,顿时阿田的那把铅笔刀一跃而起弹出了所划的界线。这样我就赢下了这把沉甸甸的铅笔刀!

我自然高兴,阿田虽然愿赌服输,表面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,但一个下午都有些沉默寡言。

在年少时光里,一把铅笔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。这种快乐源于物质匮乏与知足常乐,是如今物质丰富年代的孩子所难以体验的吧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绿之丘 ■陈明松

生活故事

二哥

■高金中文

我家兄弟三人,成长于苏北农村的一个平常人家。回首将近一个甲子的兄弟情,平平静静,各自人生也很常态。要说兄弟三人中,在平凡中有亮色的,当数我二哥。

但二哥出生时机不够巧,小时候并不招长辈待见。

先说一段往事,我外公、外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后,生养我舅舅和我母亲两人。舅舅成家后连续生了三个女儿,就是我的三位表姐,三表姐出生后,我大哥出生。

大哥出生的时机好,既是我爷爷这一脉的长孙,也是我外公外婆的第一个外孙,自然备受各方宠爱。

盼星星盼月亮,我舅舅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,我外公外婆也终于盼来了第一个亲孙子,自然宝贝得不得了,取的小名叫“四丫头”,一直叫到现在。“四丫头”就是我唯一的表哥,脑后的小辫子一直留到14岁,你说宝贝不宝贝。

“四丫头”表哥出生后一个月,我二哥出生了。二哥的幼年、童年有多不招待见:外公外婆这一边,忙自己的亲孙子都忙不过来呢;父母这一边,有大的、小的要照顾,中间的烦着呢。时至今日,父母每每谈起我们兄弟三人小时候,经常说到一件事,说二哥小时候不如大哥和我乖巧,有事没事就爱哼哭腔。有一次,父亲正在与人谈事情,他坐在桌子上又哼哭腔,被父亲一怒之下摔下桌子,差点出事。

现在想起来,二哥爱哼哭腔是有

原因的,长辈一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,对他的关心关爱比起对大哥、“四丫头”表哥和更小的我,少得太多了。

别看二哥得到的关心关爱少,但二哥完全依靠自己实现了两次命运转折。

高考,这是我们这一代农村孩子的永恒话题。二哥小学是在本村、初中是在邻村度过的,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可以想象。二哥与“四丫头”表哥一直是同学,俩人从小形影不离地玩耍,为生产队放过牛,下田插过秧、挑过粪,二哥农活干得又快又好,我母亲经常表扬他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

二哥的学习成绩平时不出挑,但初中毕业时,二哥与“四丫头”表哥一道考入年级前八名进入县城的鲁迅中学,对我父母来说,这绝对是个意外。

那时我已经在县城上初中,二哥再上县城上高中,父母的负担意外加大,但只能咬牙坚持。

县城的鲁迅中学主要招收本县各乡镇中考上来的学生,学风很好,当年的学习氛围有点像今天的衡水中学,但高考升学率并不高,所以虽然二哥考上了高中,但我父母对二哥的高考并不寄以希望,等到二哥上到高二的时候,父母已经提前给他铺好前路。

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乡镇企业正红火,我们乡正筹备办蜡烛厂,父亲多方托人,给我二哥预留了乡蜡烛厂会计位置,二哥一旦高考结束,就准备到乡蜡烛厂上班,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相当好的前途了。

但二哥更争气,高考一战而中南通医学院,让我父母意外惊喜;也是同年,我的“四丫头”表哥考上了苏州医学院。一个小村子出两个大学生,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农村,是很让十里八乡惊艳的。

二哥还有惊奇在后面。五年后,

也就是1990年,二哥从南通医学院毕业,被分配到本县人民医院小儿科,离农村老家的距离不到二十里路,农忙时还能回家帮忙,父母很满意。

但二哥工作数年、成家生女之后,对现状不满意了,主要是当小儿科医生既简单又复杂,简单在于小儿一般无大病,不过是大人们过于紧张,小病即送医,非常频繁;复杂在于小儿有病说不出、说不准,全凭医生经验,而且小儿一旦有危急重症,家长的压力全部转移到医生身上。我们苏北乡下,还特别重男轻女,如果一个危急重症小男婴没被救回来,那一帮家长亲戚追打当事小儿科医生是常有的事。那时,可能还没有“医闹”这个词。那几年里,我二哥和他的小儿科同事一样,被无辜追打过好几回,躲藏过好几回。

经历过几次之后,我二哥决定报考跨专业研究生,但本县人民医院为了医生队伍稳定,规定报考研究生必须本专业且本院委托培养,报考跨专业研究生是不可能的,除非辞职。

当时,我二哥已在小儿科工作十年,父母和我都极力反对二哥辞职报考研究生,用现在的话说,虽然小儿科专业不够香,但既然已经成家,也是抱着铁饭碗,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,30多岁了又把命运交给不可预测的未来,风险太大。但二哥决然地辞职报考苏州医学院神经外科专业研究生。在苏州读研的那三年,二哥没有工资,只有研究生的一点津贴,二嫂带着小侄女陪读,在至爱亲朋的支持帮助下,完成了学业,其中的艰苦,我二哥二嫂自己体会最深。

二哥一般不说那一段的苦,只在酒至半酣时,偶尔会说起——被小儿患者家长追打躲藏,冬天下班后晚上一个人顶风冒雪从家中去办公室备

考读书至深夜,在苏州读研时家里借钱过日子的经历,这时他的眼眶里总是晶晶发亮。

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。2003年,二哥硕士研究生毕业,恰逢泰州地级市新成立,泰州市人民医院打造全新的神经外科,那时硕士研究生毕业文凭还是很有含金量的,二哥被泰州市人民医院作为人才引进,享受到安家费,医院同时给二嫂安排了工作。之后的短短几年,二哥就成为这个科室的业务骨干,不久成长为科主任主任,至今已十多年了。

虽然二哥小时候得到长辈关心关爱最少,却是我们兄弟三人中给予父母最多关心关爱的人。过去30多年,无论是在本县人民医院,还是泰州市人民医院,父母有一点小毛病,就打个电话给二哥,二哥负责送医送药、住院陪护。

2022年夏天,父亲的老年病加重,在泰州市人民医院住院3个月,二哥二嫂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父母;2022年年末,新冠疫情防控政策重大调整,二哥自己感染上新冠肺炎病毒,在尚未痊愈的情况下,父亲在乡下老家老年病加重告急,母亲也浑身疼痛,二哥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从苏州开车赶回老家,将父母接到泰州看病照顾,扛起了兄弟三人的共同责任。没过几天,父亲在老年病发作的情况下中招新冠肺炎,生死悬于一线,二哥24小时陪护,我们的父亲幸运地被从人生边缘拉了回来。

与很多家庭的兄弟一样,兄弟之间从小到大常常是若即若离的,有时是互不服气的。说实在话,从小至今,我和二哥并无特别亲近,对他的批评我常常是不大服气的。今天,我蓦然回首,由衷说一句,我的二哥是好样的!

海上风物

弄堂口那数字

■陈茂生文

全家在石库门底层“统客堂”加亭子间里生活了70年,因为弄堂年久失修,这片石库门不算啥流派经典之作,亦无名人曾经盘恒居住,再加人口密集环境逼仄,所以“征收令”一贴,二轮征询高票通过;众邻居挥挥手开始新生活。

离别时虽有诸多不舍,但时光能治愈一切,渐渐地脑海中仅留下弄堂口“过街楼”窗户下的四个水泥数字“1926”。

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,

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弄堂在市区四处开花;若在“永不拆除”的保护街区逛街游玩,会发现在弄堂斑驳老旧的门楣上除了“春日荣和”“赏夏绿荷”等吉祥语外,不少都有四个水泥砌塑的数字。

或许能想象这样一番场景: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某日,脚手架上泥瓦工领班师傅用泥刀仔细雕塑几个数字后,脚手架随即拆除。这片纵横整齐的石库门此后的几十年、百余年间,那几个数字为无数人眺望,无论字形堂皇张扬或灰暗土朴,都是一道宝贵而独特的城市风景线。直至在推土机轰鸣声中,门楼成了一堆瓦砾仍依稀可辨。

城市大规模改造,很多老弄堂消失了,有年份标识的弄堂门楼少了更多。

而探寻“城市发展”脉络和足迹的都市考古越来越盛,无论风貌怀旧还是历史寻踪,那些代表年份的数字是最好的印证。无言的数字后面都有一些不为今人知晓的故事,尽管风烛残年,每个走过路过的人可以不懂巴洛克风格、宫廷式挑檐等,但都能想象这里曾经的辉煌风光和柴米油盐。

如今住的高楼新居与当年平房老宅相比,名分上由“里”“弄”“坊”跃然而成“苑”“庭”“城”,但总觉得气宇轩昂的小区门口若有几个数字更佳。

有句俗语说“口说无凭”。这些看上去灰头土脸的数字,不仅是房子的出生证明而且也是建造工匠的责

任和担当。传统建筑业有“物勒工名,以考其诚,功有不当,必行其罪”的戒律。南京城墙建于明朝,每块砖都有文字以供追溯。有块编号0705的城砖上有: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勳、司吏徐用、武昌县提调官县丞杨时敬、司吏黄景、总甲邢仁、甲首熊祥、小甲王琬、窑匠袁兴、造砖人夫占均美。”共52个字,9个负责制砖的府县里甲官员、监工、工匠名单,如发现质量问题了都会被问责。

如此一来,房子造好后在外墙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记,是泥瓦工职业文化的传承,那种主动授人以柄的勇气可能并非人人皆有。

恍然重回老宅,弄堂口被风吹雨淋了八九十年的水泥数字1926依然清晰可辨,就有一声赞谓“阿拉的老房子老挺刮”。